

# 何物自由主义

楊东蓀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何物自由主义

楊東尊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湖北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1- $\frac{3}{4}$ 印張·39,000字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0

統一書號：3106·73

## 目 录

|                         |    |
|-------------------------|----|
| 知識分子在斗爭風暴中何去何从? .....   | 1  |
| 何物自由主义.....             | 10 |
| 坐什么渡船? .....            | 22 |
| 人民的新聞事業不容許右派分子插手! ..... | 43 |
| 关于“叛逆性格”.....           | 50 |

## 知識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

我想联系反右派斗争，談談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

一个多月来展开的广泛深刻的反右派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全体人民之間的一种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同时展开的阶级斗争。这种大是非牵涉到一个性质重大、范围广泛的政治题目，即：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問題。这个問題关联到我們国家和全民族的命运，关联到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知識分子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須在这场斗争中鮮明地表示态度，在斗争的风暴中檢驗自己的立場。

### 有些善良的人神魂失去了主宰

應該說，革命的、愛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在这一場斗争中是表現得好的，他們和广大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义憤填膺地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分子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許多善良正直的人，对这场斗争却采取了不是积极的态度：他們和广大工农群众所表示的严正态度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們当中有些人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无动于衷，認為这场斗争与自己无关；他們当中有些人对右派的言論起共鳴，表同情；当“人民日报”撰写社論支持工农群众和左派反击右派的时候，工农群众和左派人士无不拍手称快，而他們当中有些人却說“社論发表得

太早了”，甚至說“社論對右派的反批評太過火了”；他們當中有些人在这场斗争中含含糊糊、躲躲閃閃；他們當中有些人有一種迷惘的感覺，神魂失去了主宰，似乎自己被一條纖細的絲綫吊懸在萬仞高空；他們當中有些人對这场斗争採取保留、觀望甚至抵觸的態度。這些情況，隨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開展，隨着右派分子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慌目驚心的言論行動的進一步揭露，已經有所扭轉。許多人已經認識这场斗争的性質和它的嚴重的政治後果，因而振臂奮起，投入戰鬥。但是，不管怎樣，这次斗争的前前後後，已經充分暴露了知識界思想上的混亂情況。我們生活和工作在知識界中，我自己也算一個知識分子，不能不為這種情況而感到心情沉重，也不能不探索一下導致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

### 为什么被右派分子灌了迷湯？要从知識分子 本身的弱點尋找原因

應該說，七年來，在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的指導下，依靠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關懷和幫助，依靠知識分子自己主觀的自覺的努力，知識分子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他們劃清了敵我界限，站到人民的立場上來；他們為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定的聰明才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經過刻苦學習和實際鍛煉，已經逐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並且基本上適應自己社會政治地位的轉變，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一員——光榮的共產黨員。我們認為，對於知識分子的這種進步應當有足夠的估計，不能因為在這次反右派斗争中所出現的思想上的混亂情況而把知識界的進步一筆抹殺，全盤否定。但是，足夠的估計應當意味著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應當是添枝加葉地為知識分子抹粉

擦脂。現在的問題是，許多知識分子對自己的進步估計過高。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明明白白立場問題沒有很好解決，但卻有人不懷好心地向知識分子討好獻媚，倡言“現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已進入了細致的觀點和方法問題”（費孝通：“早春前後”）。明明白白許多知識分子對我們的國家事務還缺乏充分的主人翁感覺，但卻有人心懷叵測地鼓勵知識分子不要做“脫穎而出的毛遂”，要做“隆中待訪的諸葛亮”（羅隆基：政協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明明白白知識分子還沒有很好地理解個人與集体的關係，沒有很好地理解一滴水只能放在浩瀚汪洋的大海裡才能永不干涸的道理，但卻有人惡毒地鼓勵知識分子的自大狂，說“十個大學教授可以抵得上十萬群眾”（羅隆基）。這些別有用心、對黨、對人民翹尾巴的知識分子的言論，在知識界裡面播毒甚廣，流毒甚深，以致有不少人被他們灌了迷湯，誤認為思想改造已經差不多了，“一間房、兩本書”的要求出來了，“馬列主義不行時”的怪論也出來了。自然，盡責怪這些狼子野心的知識分子也還是不全面的，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知識界對思想進步估計過高的現象，還應當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弱點去尋找、去發掘。這些年來，我在高等學校裡邊工作，和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在一起學習，以為常地聽到一種“提高一步”的說法。就是說，每次學習運動將屆結束，人們在寫學習總結或談到學習心得的時候，總喜歡說（或者是醉心於過高地估計成績，不假思索地說），“通過這次學習，我的認識和思想提高一步”。例如：“通過土地改革文件的學習，我的認識和思想提高一步”；“通過抗美援朝運動文件的學習，我的認識和思想提高一步”；“通過鎮反、肅反運動，我的認識和思想提高一步”；“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我的認識和思想提高一步”；“通過總路綫文件、憲法文件、蘇共 20 次黨代表大會文件、‘關於無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八大’文件、‘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的学习以及十大关系报告的傳達，我的認識和思想提高一步”，等等。應該說，人們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学习，的确是有所提高的；也应该說，人們思想認識的提高，的确是要一步一步、循序漸进的。但是，奇怪得很，提高一步又提高一步，临到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結果却等于挨了一記“悶棍”，連六項政治标准也心中无底，从高处往低处狠狠地蹶了一跤，一落千丈，回过头来还在抱屈地叫嚷“言者无罪”，抱怨地責怪党为什么早先不打个招呼，把六項政治标准揭示出来（这是指好心的知識分子而言，右派分子不在內）。这种情况，除了把思想改造的成就估計过高、把自己思想認識的提高估計过大、而在每次学习中沒有深刻地結合自己的血肉骨髓外，还能够找到其它任何别的解釋嗎？总之，这次反右派斗争所暴露出来的知識界的思想混乱情况，向我們提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有成績，但知識分子自己把这些成績估計过高，才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接受一次大大的慘痛的教訓！

### 党对知識分子早有公允的估計和明确的指示

那么，党对这个問題怎么看法呢？

还在去年1月間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在“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我国的知識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報告”又接着指出：“知識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們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在我們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間、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間不分敌我；他們不滿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資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們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

他們拒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輕視勞動人民出身的幹部，不願意同工人農民和工農幹部接近；他們不願意看見新生力量的生長，認為進步分子是投機；他們不但常常在知識分子和黨之間製造糾紛和對立，而且也在知識分子中間製造糾紛和對立；他們妄自尊大，自以為天下第一，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領導和任何人的批評；他們否認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利益，看一切問題都從個人的利益出發，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贊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對。”因此，周恩來總理在“報告”中說：“繼續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是黨在過渡時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從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可以明白：黨對知識分子的進步有着足夠的估計，黨對知識分子現存的缺點和弱點有着清醒的認識，黨對知識分子今後進行思想改造的任務也有着明確的指示。黨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是公平恰當的。對照今天資產階級右派的言行和一般知識分子的思想混亂情況，我們一方面感到黨的領導的預見性和黨的政策正確性；另一方面也感到我們知識分子辜負了黨的殷殷期望，“依然故我”，長進不大，我們應該是懷着負罪的心情來向黨匯報的。

###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為什麼未能盡如人意？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在火熱的群眾鬥爭中承受嚴峻的考驗

現在應該問：為什麼我們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未能盡如人意？為什麼我們的立場未能改變過來？為什麼在反右派鬥爭中知識界的思想如此混亂？

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知識分子沒有經過實際的鍛煉，沒有在火熱的群眾鬥爭中承受嚴峻的考驗。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雖然猛烈一些，但當時的政治形勢賦予思想改造運



动的目的，只是要知識分子划清敌我界限，站到人民的立場上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政治形势要求知識分子的已不是一般的人民立場，而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立場。社会主义革命，我們采取的是和平改造的、不流血的办法，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和人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大变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引起了强烈深远的震动，但对于知識界的冲击却显得小一些。冲击小一些并不見得是好現象，因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知識界在立場方面的轉变。未經過风霜雨雪的、未經過深刻冲激的、未改变立場的知識界，一經投入波浪翻滾的沸騰的新生活当中，就不能不时时、处处感到不习惯、不协调、不熟习、不适应了。

**为什么罗隆基費孝通的臭气熏天的言論在不少知識分子中引起共鳴？无他，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場相近而已**

正是由于知識界放松了在火热斗争中的思想改造，放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进行立場的轉变，所以章罗联盟就把魔爪伸入这片“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培育毒苗毒草。也就是說，以知識界为“垫脚石”，作为他們梦想的“政治資本”和“群众基础”，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正是由于知識界放松了在火热斗争中的思想改造，放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进行立場的轉变，免疫力不强，抵抗力不旺，所以罗隆基、費孝通之流的臭气熏天的文章，居然会在知識界的一部分人当中引起共鳴。罗隆基恬不知耻地以知識分子的“代言人”自居，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會議上的发言，實質上是一篇反党的、向党挑战的“通牒”。明眼人易于发现这篇发言的意旨，即：一方面向党要挟，另一方面籠絡一部分落后

的知識分子，要他們自甘落后，對祖國的命運不關心，對社會主義的命運不關心，對國計民生，絲毫用不着有什麼主人翁的責任感，只有靜待共產黨來“禮賢下士”、“三顧茅廬”。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和“早春前後”，則是兩篇包藏禍心的文章，字字句句埋了雞骨頭，行行段段摻雜了砒霜。他一方面傾瀉了自己的資產階級的世紀末的頹廢的感情，大談其自己的“體質”與“氣候”的適應關係，以便來感染那些在偉大時代仍然有落寞之感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他不懷好意地煽惑人們去揭蓋子：先揭“百家爭鳴”的蓋子，後揭“互相監督”的蓋子。他不主張“欲揭還罷”，而主張“遲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開了比沖開為妙”。如果人們把他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中對知識分子在“春暖花開”時節“發揮政治積極性”的號召，把他在“早春前後”一文中要“沖開”“蓋子”的那種氣勢逼人的姿態，再和章羅聯盟的核心骨幹以及其他右派分子到處點火、向黨進攻的事實兩相對照，就可以看出費孝通用心之險惡了。一篇發言和兩篇文章，出現在反右派鬥爭的前夕，本來，透過紙背，人們可以看出右派分子的嘴臉；細審他們的用語行文，人們也可以嗅到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氣味。但是，知識分子沒有這麼作，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在為羅隆基這篇酸臭發霉、“收買人心”的發言喝采，也有不少知識分子在為費孝通這兩篇專門唱反調的“雜文”叫好。為什麼？無他，臭味相投、聲氣相通、立場相近而已。當人們揭穿了章羅聯盟等右派分子的猙獰面貌以後，那些喝采叫好的知識分子究竟應當如何自處呢？除了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鍛煉自己的立場，提高自己的革命嗅覺和革命警惕，還能有別的什麼辦法么？

**章罗联盟的丑恶嘴臉揭露以后，那些“好心”的知識分子該怎么办？不去掉温情主义的面紗  
是看不清楚路途的**

現在，人們應該有理由进一步問：当章罗联盟的丑恶嘴臉揭露以后，那些“好心”的知識分子应当怎么办呢？

我認为，最好的办法，是挽起袖子，坚决撕破他們的肮脏面子，坚决搞垮他們的臭架子，讓人們看看：这究竟是一流什么样的貨色！有人說，手軟，下不了手。为什么手軟？为什么下不了手？一因人熟面熟，大家相处多年，臉面相碍；一因这些人有些“才”，不要过分使他难堪，还得留点回旋余地，以便他們能在悔罪后有所报效于人民。好一副温情主义者的面孔！你和章伯鈞、罗隆基等等人面熟，有交情，你不打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你置六亿人民于何地？你对这批人情深誼厚，对六亿人民情寡义薄，这又是什么立場？錢偉长、曾昭掄、費孝通等那么一小撮自高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美留学生的确有“才”有“学”，的确够高深渊博的，但他們心怀貳志，“才”大“学”广，于人民又有何益？你坚决作为右派打他們，如果他們能回心轉意，洗心革面，朝向人民，为人民做事，这才算够朋友，講义气，对人民也才会有好处。否則，这样的温情主义，反映到政治上来，只能是一种毫无是非的自由主义而已。我在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战斗中經常思索一些問題，待到我发现費孝通这位“学者”也在用“温情主义”的幌子来掩盖章罗联盟及其核心小集团的反动言行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温情主义”有如此广泛的“用途”！这就使我警惕，深深地認識到：野性难驯的狼总归是要吃人的，养狼是要貽患的；对右派分子打击得不狠，不坚决，禍害也是无穷的。不去掉温情主义的面紗，自己究竟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場来参加这场反右派的斗争呢？

总起来說：从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混乱情况来看，从知識分子对自己进步估計过高的现状来看，从党对知識分子的缺点的分析来看，从知識分子可能作为政治野心家的“垫脚石”来看，从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来看，等等，都从根本上說明一个问题：一切追求进步的、善良正直的、爱国的、革命的知識分子，都必须学习鲁迅，下壮士断腕的决心，无情地解剖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右派的群众斗争中，加强思想改造，改变自己的立場和世界观。对知識分子來說，反右派斗争中知識界思想混乱情况的大暴露，的确是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訓。能感到这份痛苦，能吸取教訓，繼續前进，加强思想改造，就能感到脱胎換骨的愉快，否則，一步掉队，百步就跟不上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現在多数知識分子还不能說已經完成了这个轉变。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識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主席的話是語重心长的！我們应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走。只有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积极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从基本上解决了立場問題，才能死心塌地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何物自由主义

### 右派分子的魔术戏法

章罗联盟駐武汉的专员——馬哲民，現在已經陷入武汉的革命知識界和人民群众的重重包圍之中。假面具被剝落了，露出本来面目，原来是一个坚决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流氓。

在反右派斗争进入深入阶段的时候，馬哲民虛晃一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自己說成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才犯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且据說，这位可爱的馬先生是因为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才使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意識“陡然加强”的（見馬哲民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瞧：多么輕松的脫罪魔术！多么荒唐混乱的邏輯！

馬哲民之流是不是“自由主义”，人們可以根据他的罪行去判断；馬哲民本人自可不必厚着臉皮說自己的“思想檢討，已經超額完成”（1957年7月5日馬哲民自北京致中共武汉市委書記李尔重的信），因为人們知道他們的罪恶言行远远不止于此。但是，馬哲民之流这种“眼明手快”的魔术戏法，至少說明并使我們联想到三点：

第一，它透露了右派分子的內心秘密。据他們設想，所謂自由主义者，所謂民主个人主义者，还不能算是頂坏的东西。这样一襲华丽的服装，倒是可以借用来包裹住他們反共、反人

民、反社会主义的脏臭的肉体和发霉的灵魂。

第二，现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張东蓀早就露了原形，这里存而不論），特别是他們的头面人物，如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費孝通、曾昭掄、潘光旦等等，恰恰就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冗长的“白皮書”中所殷殷寄望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旧病未痊，或者压根儿就未进行治疗，在季节轉換时重新发作，这是用不着有什么奇怪的。

第三，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解放已經八年，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經取得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已經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我們国家的領導核心力量已經肯定，虽然时移势轉，但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我們国家（更确切点說，在我們知識界）有一点薄薄的社会基础。在资产阶级右派首先发难的这场可耻进攻中，右派分子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庫中搬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旧民主主义的锈戈鈍矛，而这些破烂兵械（或者說口号），居然对知識界有一股不大不小的迷惑力，使知識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和初期阶段，对右派分子的言論行动将信将疑，有同情的，有共鳴的，有观望的，有保留的。总之，在一段时期內，知識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明去向，不辨事物本質，惶惶然不知自处。

对于第一点，“衡罪量刑”，可以由人民群众去作結論。对于第二点，何去何从，可以由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和其他右派分子去作选择。他們如果不幡然悔悟，改弦更張，下决心剜烂肉，割痈疽，向人民投降伏罪，那么，他們就会自絕于人民。对于第三点，我們認為，既然自由主义的破銅烂鉄还能在思想上繳了知識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械，我們就有必要在思想战线

上又一次进行一些消毒工作，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彻底地清算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 自由主义者的幻梦早已破灭

自由主义是欧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上升时期的产物，它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服务的。当资产阶级还作为一个代表进步的生产力的阶级的时代，自由主义是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即是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片褪了颜色的碎布，而由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所代替了。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上的要求，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代起，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已经宣布了它的必遭夭折的寿命，或者说，干脆宣布了它的死刑。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并不许可中国能够有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尽管欣赏和热爱从西方学来的一套东西，但他们的师傅却总是不同意他们这些不识抬举的学徒在自己的本乡本土搞那一套东西。这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来就不曾有过他们的黄金时代。全国解放前夕，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曾经一度搞得蛮热闹，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提出了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和钱昌照、吴景超等主编的“新路”，在那段时期鼓吹自由主义的路线最为得力，吹鼓手有很多，“政论家”也不少，形形色色，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固然不好，该打倒；共产党也不见佳，不该欢迎；还是我们来，实现中间路线的幻

夢似的政治主張。其實，中間路綫的人自己也明白，他們在中國并無所凭借，他們並沒有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他們要反共，就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向蔣介石反動派的政府討杯殘羹剩飯，或者是干脆投靠美國主子，作為美國侵略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工具。既要反共，又不投靠蔣介石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這是不可能的。在自由主義者的自欺欺人的恍惚迷夢尚未蘇醒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就以雷霆萬鈞之勢，擊潰了由美國出錢出槍武裝起來的國民黨的反動軍隊，完成了全國的解放，隨後即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自由主義者形單影孤，在這時也不能不夾在人民大眾的行列里，歡迎莊嚴雄偉的解放大軍進入中國的各個大城市，歡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行使自己的領導職權。但是，此時此際，自由主義者是很勉強的，他們並沒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只是“逆來順受”，“騎毛驢，看唱本”，走着瞧。美國帝國主義分子懂得這些人的心理，所以在上面提到的“白皮書”中，除了掩飾自己侵華政策的失敗的丑態以外，還一反常態地吹捧這批自由主義者、民主個人主義者為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艾奇遜甚至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這是美國侵略者狼子野心地埋下的十分惡毒的“伏筆”，中國人民，包括覺悟過來了的知識分子，都相約提高警惕，不中其計。但一些自由主義者、民主個人主義者並沒有從自己的政治幻夢的破滅中吸取教訓，也沒有充分理解這一“伏筆”包藏的禍心，這就是今天我們還要花一些時間精力來做思想消毒工作的理由。

### 對共產黨的諄諄告誡充耳不聞

中國共產黨始終認定，後來的歷史也如此証明，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主義



革命只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創造条件，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中間势力”“第三条路綫”“自由主义者”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認定他們是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統治（即使是暫时的、动摇的）的前提下的可以尽量爭取教育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中曾經說明，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資产階級群众，應該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們的基础上，一方面給以寬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許其自由主义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則給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們的联合”（“毛澤东选集”第1013頁）。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讓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上露臉，为的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自由主义者自己，讓大家明白此路不通。等到全国基本解放，中国共产党又充分运用“白皮書”这份美国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供状”，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資产階級的知識界进行一次广泛的教育，新华社发表了六篇評論“白皮書”的社論，苦口婆心地号召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丟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共产党苦心孤詣，仁至义尽，應該說是尽到了它的职责的。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諄諄告誡和教育下，的确有大多数原先篤奉自由主义路綫的人轉變了态度，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后一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作了許多好事。中国共产党欢迎人們这样做，中国人民也欢迎人們这样做。但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完全沒有轉變，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識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沒有充分轉變。因此，八年过去了，上述两类人，在新的形势下，前者成了資产階級右派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帅和急先鋒，后者成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俘虏或俘虏对象。应当說，